

亨廷顿之后的建构主义文明政治研究

董 亮

[内容摘要] 近年,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文明研究及其理论建构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多部相关文集陆续问世。其中,帕特里克·杰克逊与马丁·霍尔主编的《文明身份》以及彼得·卡赞斯坦主编的文明政治三部曲^①均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这些建构主义学者通过借鉴社会学理论中的文明研究成果,丰富了国际关系的文明研究议程,有效地揭示了亨廷顿理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并且撼动了其文明研究的主导地位。这些研究在强调文明具有多元多维性的同时,更加关注文明身份的塑造和文明进程的走向。在实证研究上,建构主义学者还在美欧关系和中国崛起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的这些学术努力不仅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文明研究,同时也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 文明 国际关系理论 亨廷顿 建构主义

[作者简介] 董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后,^②便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强烈的回应。在此基础上,亨廷顿又完成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文明冲突理论。^③“9·11”的恐怖袭击令西方世界深刻意识到在面对国际恐怖主义时的脆弱与来自不同文明的“冲击”。^④随后,

① 彼得·卡赞斯坦的文明政治三部曲为 Peter J. Katzenstein ed., *Civilizational Politics in World Affairs Trilogy: Civil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Plural and Pluralist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Anglo-America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al Identities beyond West and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ivilizational Processes Beyond East and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②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1993, pp. 22 ~ 49.

③ 亨廷顿的基本论调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明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安全问题的将是文明间的冲突。亨廷顿主要基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将全球化分为7种或8种文明。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④ [美]斯皮瓦格著,董仲瑜、施展、韩炯译《西方文明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03页。

“文明的冲突”很自然地成为了大众媒体的常用话语。然而,对于亨氏的理论,中西方学界大体呈现出了修正和批评的态度。^①

一、文明的冲突及其批判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使向来不够重视该领域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关注文明问题,一些建构主义学者更是借鉴跨学科的文明研究成果加入辩论,对其核心假设进行了检测和批判。^②

1.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决定未来冲突的是文化与文明。进而,他悲观地预测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将爆发战争,国家的地缘重要性取决于其位置是否位于或接近由文化划分的不同文明断层线之上。

他归纳了导致文明冲突的因素:(1)本质上的宗教差别;(2)文明间不断增加的互动所产生的自相矛盾且不断增长的差别;(3)民族国家作为群体认同来源的作用不断被削弱,宗教则经常填补由此产生的空缺;(4)非西方社会中社会精英的非西方化和本土化;(5)文明本质上的相对不可改变性;(6)经济区域主义的增长,其影响强化了文明意识。^③冷战后的世界将会沿着文明的界限进行着重组。

亨廷顿对于文明间关系的表述充满了文化现实主义的色彩,并将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完全割裂开来。随后,他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从所谓“特性和身份”问题入手,分析了美国特性的内涵,将“文明冲突论”的焦点从全球范围转移到美国本土的族裔关系上。^④究其根本,亨廷顿的写作动机是将“文明冲突论”提交给美国外交决策者,作为防止美国卷入冲突的战略而提出。

2. 建构主义对亨廷顿文明研究的批判

现实主义学者对亨廷顿的“文化现实主义”的批判重点,在于认为文明内部的冲

^① 参见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6页;王缉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

^② [美]彼得·卡赞斯坦编,秦亚青、魏玲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4页。此外,美国学者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撰写的国际关系理论权威著作《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只有1990年第三版的第57—58页,有汤因比文明理论的两段的介绍,2002年的第五版有两段关于“文明冲突”介绍。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188页。

^③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188页。

^④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0~401页。

突多于文明间的冲突。与此不同,建构主义学者的批判则是从文明理论、文明进程及文明身份入手的。

首先,质疑亨廷顿的文化实体中的宗教地位问题。虽然,亨廷顿将文明界定为“一个‘文化实体’是根据共同的客观因素,诸如语言、历史、宗教、习惯、制度,根据主体的民族自决等加以界定的。”但是,亨廷顿却把宗教融入政治事务中去研究,把宗教当作文明,并置于世界政治的核心位置。^①这一点是与亨廷顿的文明定义相矛盾的。^②此外,哈兹波罗和佩蒂多还注意到,宗教已经在现代的条件下被明显地概念化于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了。宗教被视为对世俗制度和世俗思维的否定,被视为回避理性原则的传统。^③他们认为宗教根本上是处于边缘的,国际政治就像是一个自治的空间,对于国际政治的反思并没有因为宗教的存在而受到根本性的干扰。“宗教”无疑被非现代化。^④

第二,在批判亨廷顿文明本体论时,厘清了“属性”和“过程”两种文明本体的区别。属性本体论将客体视为属性的集合,这些属性围绕一个核心聚合在一起,这个核心是某种完全无属性的实体存在,客体的各种特性以该实体为核心进行排列。杰克逊认为属性本体论在世界政治的文明研究中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亨廷顿的文明本质主义就是这种科学本体论的有力代表,他将文明定义为“血缘、语言、宗教(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共性,并以此为基础确认了几个现实存在的文明。就其核心而言,文明本质主义者研究和宣称的既是西方文明的利益,也是那些自认为是西方文明参与者的利益。^⑤

第三,指出“文明冲突论”的一个本质性缺陷是其在宏观层面上把文明假定为一种先天的存在。亨廷顿以文明本质论的核心思想来看待国际冲突,其错误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文化因素和一般的宗教因素在冲突升级的起始阶段很少具有决定性影响,而真正起作用的是社会经济问题等更为实际的变量。文化因素在这种冲突的发展初期并未独立发挥作用,充其量只是一种介入性甚至附属性因素,而要随着

① [美]彼得·卡赞斯坦编,秦亚青、魏玲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204页。

② Martin Hall and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eds.,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ivil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England: Hampshire, 2007, pp. 1~2.

③ [意]佩蒂多、[英]哈兹波罗编,张新樟、悉颖瑞、吴斌译《国际关系中的宗教》,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④ 同上书,第20页。

⑤ [美]彼得·卡赞斯坦编,秦亚青、魏玲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214~215页。

时间的推移,在一定程度上冲突升级之后,才会变成独立的推动性因素。^①

上述建构主义学者对文明政治问题的大量探讨,是从范式研究入手的,重新思考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及文明互动的关系。^②他们尝试建立文明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分析文明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并且试图回答以下一些核心问题:首先,文明是国际政治的背景还是施动者?其次,文明身份是否是可变的?文明间的互动是否一定是异质碰撞?最后,为何文明应该成为国际政治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分支?

二、建构主义的文明研究议程:理论研究

文明研究是一个很宽泛的领域,横跨了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近几年,建构主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文明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通过借鉴社会学的文明研究成果,将三种文明理论,即多元现代化模式、文明多元威望区域理论和文明多元过程、多元实践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

1. 建构主义文明研究的理论渊源

(一) 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化模式

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从文明的视角来理解现代性。^③他将现代性视为一种独特文明,认为其与历史上其他类型的文明的区别就在于它是轴心文明转折的产物。^④艾森斯塔特通过对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概念的批判提出了“第二轴心文明”,其核心是多元现代性理论。所谓多元现代性是指现代性不是单一的西方化而是多元化,现代世界的文明史是多元的文明史,现代性也应该是多元的现代性的理论。艾森斯塔特认为理解现代世界,最好的方式是将它看成一个现代多样文化不断发展和连续重组以及具有特色的现代制度模式的发展过程。^⑤所有轴心

① 详见[德]迪特·森格哈斯著,张文武译《文明内部的冲突与世界秩序》,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

② 相关研究可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多元多维文明构成的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魏玲“后本质主义文明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秦亚青“文化、文明与世界政治:不断深化的研究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王存刚“文明史探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以陈乐民、亨廷顿为个案”,《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③ 关于艾森斯塔德的学术回顾参见Roland Robertson, S. N. Eisenstadt, “A Sociological Giant,”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Vol. 11, 2011, p. 303.

④ 1949年,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中提出轴心时期(Axial Period)的观念,用以概括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同时出现在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希腊等地区的文化突破。参见何二元“慎谈‘新轴心时代’”,《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第135页。

⑤ S. N. Eisenstadt, “The Re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Arenas in the Framework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0, p. 597.

文明都具有一种更广泛的、最重要制度的发展趋势,并且是由一个或多个中心建构的。中心建立的过程关联着作为自主的和特殊的象征性框架的大传统的建构,也与大小传统之间的转变联系在一起。^①

实际上,艾森斯塔特正是从对现代性的各种因素的把握中发展出“多元现代性”的观念。^②他认为,作为对社会发展状态、趋势的一种宏观性的描述和概括,现代性是一个多维的复合性概念。除了固定的角色之外,它们还需要承担多种其他的角色,有可能属于超越地域的、处于变化之中的共同体。不同文明的历史发展特征,与其与现代化进程的相互影响,及其所产生的现代性的文化纲领,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③

艾森斯塔特将“多元现代性”作为宏观历史的中心主题,在对长历史周期的考察中,将宗教置于中心位置,得出了现代社会不趋同于某一共同模式的结论。多元现代性的观点假定理解当代世界的最好办法就是看其故事的不断构成和重建的多重文化表现。^④建构主义学者接受了艾森斯塔特的观点,即文明是多元多维的(每种文明内部也存在多种文明形式,分别来自于不同的传统,各存歧见而又相互竞争)。在此基础上,卡赞斯坦提出了“多态全球主义”的概念。^⑤

(二) 兰德尔·柯林斯的文明多元威望区域理论

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建立了文化竞争与威望区域理论。^⑥柯林斯将文明界定为围绕一个或多个文化中心所形成的威望区域。在这些威望区域内,吸引力以不同的力量向外发散。距离不仅仅指地理上的远近,而是以一种吸引力网络的形式出现,将威望通过各种渠道传输出去,超越或是进入其他文明区域。文明的力量在于增强和减弱文明吸引力的实践活动。文明的吸引力表现在创造力上,主要是由其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不同立场和不同观点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

文明威望区域是由多元的、相互竞争的网络和远距离联系构成的,其标志是在与

① [以]艾森斯塔特著,刘圣中译:《大革命与现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

② S.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Winter 2000, 129, 1

③ [以]S. N. 艾森斯塔特,王晓山、戴茸译《日本文明:一个比较的视角》,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504~506页。

④ Timothy A. Byrnes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eds., *Religion in an Expanding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

⑤ Peter J. Katzenstein ed., *Anglo - America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al Identities beyond West and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242.

⑥ 参见 [美]鲁思·华莱士、[英]艾莉森·沃尔夫著,刘少杰等译《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扩展》(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119页; Randall Collins,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Randall Collins, *Macro - History: Essays in Sociology of the Long Ru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世界的接触中所表现出来的吸引力和传播能力。文明威望区域吸引着各种各样的学生和来访者,有的甚至来自十分遥远的地方。同时,具有高度威望的区域也会派遣教师和使者到周边地区和其他文明区域。多样化的不同流派之间的激励辩论提升了创新能力,也阻止了单一观点的形成。^①为了在军事和经济上追赶先进国家,其他国家也需要大量模仿文明威望区域的典型实践活动。这些国家热切希望发掘和促进本区域的创造力,使其不再处于文明边缘地带。^②柯林斯在研究中,使用哲学家在各文明网络中的分布来证明文明吸引力的存在。(见表 1)

表 1 各文明网络中哲学家的分布^③

文明	代 (GENERATIONS)	主要	中等	重要哲学家合计 (主要 + 中等)	次要	总计
中国 (公元前 535 - 公元 1565 年)	63	25	61	86	356	440
希腊 (公元前 600 - 公元 600 年)	36	28	68	96	237	330
印度 (公元前 800 - 公元 1800 年)	78	22	53	75	272	350
日本 (公元 600 - 1935 年)	40	20	36	56	157	210
伊斯兰教、犹太教世界 (公元 700 - 1600 年)	27	11	41	52	420	470
基督教世界 (公元 1000 - 1600 年)	18	11	46	57	360	420
欧洲 (公元 1600 - 1900 年)	9	19	61	80	350	430
总计	271	136	366	502	2 152	2 670

柯林斯的文明理论极其简约,其贡献在于使人们对文明的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与文化活动上。文明不再是一个行为体,也不再是行为体的属性,而是一组关系和实践活动,是一种对身份认同的基本建构。在此基础上,伊曼纽尔·阿德勒在文明作为实践共同体的研究中,提出这一区域或者网络中拥有一个或者多个中心且具有物质的和文化的吸引力,从而吸引着其他的文明,进而解释文明实践。

(三) 诺伯特·埃利亚斯的文明多元过程和实践理论

① [美]彼得·卡赞斯坦编,秦亚青、魏玲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2 年版,第 21 ~ 22 页。

② 同上书,第 23 页。

③ Randall Collins,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7.

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著作《文明的进程》中阐述了文明的多元过程和实践理论。这一理论对国际关系中新一代的文明研究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通过对文明的社会和心理起源的研究,探讨了影响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组织及其成员情感生活的长期变化模式。埃利亚斯认为文明的进程不是单线式的或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将文明视为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没有零点也没有终点;它并非持续不断,而是阵发式的、浪潮式的,有涨潮也有退潮。^①他在《文明的进程》中强调三点:首先,相互依存的网络表现出比个人的计划和动机更有力度的能动性,但同时一切并非已经“前世注定”。再者,趋向是有条件的变量,不可将其实体化。对情绪愈益加强的调控是一种变量,它取决于社会相互依存的水平,而社会分化又归之于竞争的压力。第三,反对单线式发展,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不可用单方面的因果关系来加以解释。在埃利亚斯看来,社会发展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目的”。相互交织的结构就是从相互交织的结构发展起来的。一言以蔽之,文明的进程完全是由多元的实践方式决定的而非先验的。^②

2. 建构主义文明政治理论的建构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文明是复杂的,文明往往是与诸多概念相联系的,如社会、进步、发展、宗教、文化、帝国,甚至人类。^③这些关联表明,在一些方面,文明的概念与社区、社会的进化、特殊的本体或主体间框架、治理制度、人类的遗产是同义的。与此同时,文明也是一个独特的概念:首先,是体现在其相关意义的广度上;第二,某种程度上这个概念既是人的存在物,也是物质和观念维度上的共混物。^④建构主义学者秉持了“布罗代尔式”的文明观,研究国际关系中文明间的互动,这一立场更加关注文明身份的塑造和文明进程的走向。

(一) 多元多维的文明概念

建构主义学者认为文明架构中包括了不同类型的政治行为体,并且具有多元多维的特性。文明在国际上的地位取决于三种因素:(1)现有权力和威望的认可度;

① [德]诺伯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576~580页。

② 同上书,第574~575页。

③ 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肖昶等译《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Martin Hall and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eds.,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ivil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England: Hampshire, 2007, p. 15.

(2) 有效历史被重视的程度; (3) 未来号召力大小被认识的程度。^① 关于文明的概念, 建构主义强调:

第一, 文明并不是扩大了民族国家, 也不是具有高度内聚力的文化复合体, 而是松散聚合的、具有内部差异的、以精英为核心的、被整合到全球范围的社会体系。当然, 文明也存在着重要的共性。^② 卡赞斯坦并未将文明视为以单数形式出现的实体, 亦即没有将文明视为具有高度的文化内聚力和基于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形成的等级式组织形态, 并且将这种文明的发展方式称之为“多态全球主义”。^③ 在多元现代性之中寻找一种主导的叙述, 如世俗主义的增长或不可避免的文明冲突, 它们在连续重塑其历史的各种文化中表现出来。这些表现(programs) 适应那些大型的现代化历史进程, 如世俗化、工业化和民主化。^④

第二, 文明被描述为聚合体和复合体两大类, 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可以变化的。文明是兼具内部差异与松散聚合的文化体系。由于存在内部差异, 所以文明只能是有选择的移植, 而不是全盘的改变。文明作为基本的社会建构, 可以成为物化的政治形态, 尤其是当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相遇的时候。文明构成的世界不是霍布斯的无政府世界, 不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也不是帝国或世界城市。文明是弱制度化的社会秩序, 存在于各种实践和过程之中, 同时也被这些过程与实践所建构。

第三, 文明的互动并不遵循现实主义逻辑。卡赞斯坦认为文明的重要性在于文明是多元的, 例如伊斯兰文明并不汇聚在宗教极端主义周围。与中国和美国一样, 伊斯兰文明对“无可争议的真理”也有冲突和分歧, 这些分歧反映了其内在的多元性, 以及它的外部背景。^⑤ 亨廷顿的分析则将西方视为反对变革的、维持现状的力量, 并且充满疑虑地应对那些修正现状的非西方文明的崛起。^⑥

关于文明, 卡赞斯坦认为有两种基本观点: 第一种是认为各个文明镶嵌在一个全

① [美]彼得·卡赞斯坦编, 秦亚青、魏玲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 多元多维的视角》,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2 年版, 第 28 页。

② 同上书, 第 4~6 页。

③ Peter J. Katzenstein ed, *Anglo - America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al Identities beyond West and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242.

④ Timothy A. Byrnes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eds, *Religion in an Expanding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5.

⑤ [美]彼得·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 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和中国化”, 《观察与交流》2011 年 6 月 30 日版, 第 4 页。

⑥ 同上, 第 9 页。

球文化共同体之中,文明有其内在的多元性。第二种是亨廷顿式的,认为文明是内聚的、内部高度一致的、无差别的,同时具有类似于国家的行动实力。“文明的冲突”的错误在于其一元论的观点。

(二) 过程本体的逻辑

建构主义学者使用后本质主义作为文明研究的范式,坚持以过程(process)本体的逻辑对待文明研究。文明是复杂多样的实体,能够朝着各种不同的方向发展。文明不是弹子球游戏,也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具有多孔的、对外开放的特征。^①他们认为,亨廷顿认定已经出现“儒家(教)—伊斯兰教联系将会对西方的利益、价值和权力构成挑战”,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冲突的焦点将是在西方与几个伊斯兰教—儒家(教)国家之间”,这一断言是错误的,带有文化威胁的种族观点的危险。他们认为亨廷顿将一种文明视为离散的客体,是一种带有“持久本质”的“事物般的存在”,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视角。^②

建构主义的文明研究学者认为“过程本体”应当替代亨廷顿文明研究中的“属性本体”。过程本体这种科学本体论不是将客体视为属性的集合,而是将客体存在嵌入于一套逐步展开的交易机制和关系之中进行解析,这些机制和关系又不断地对客体进行再造。可以说,两种不同本体的区分是建构主义文明研究的最大贡献。本质主义与后本质主义范式的界定如下(见表2):

表2 属性本体与过程本体^③

	学者界定	参与者界定
属性本体	利益	身份
过程本体	结构域境	边界实践

从上文提到的艾森施塔特和埃利亚斯的理论来看,建构主义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过程转向特征,强调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习惯、原则和行动的历史传统构成的复杂复合体,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

(三) 文明进程中的实践性及互构关系

^① [美]彼得·卡赞斯坦编,秦亚青、魏玲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204页。

^② Martin Hall and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eds.,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ivil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England: Hampshire, 2007, p. 6.

^③ 参见[美]帕特里克·杰克逊,“如何进行文明研究”,载彼得·卡赞斯坦编,秦亚青、魏玲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214页。

近年来,西方国际关系学者重新发掘了实用主义与实践的范畴,并深受皮埃尔·布尔迪厄^①和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影响。他们认为实践是在能力、话语和物质元素之间的平衡中变化的。文明能够没有明显相互干扰地平行存在;它们可以共生发展,形成连贯的整体,其中不同的集合创建了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能够彼此形成混合动力进而创造新的实践;而它们也可以存在于相互从属的关系之中。^②他们的核心观点是文明之间的关系变化取决于文明实践。

文明是环境结构的一部分,它影响国家的利益和对外政策。环境结构与身份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关系。身份的概念是联系国际环境和国家利益的一个关键点,指的是行为体所持有和表现的、通过与重要“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个性和独特的形象(自我身份),所以身份涉及的是相互建构以及自我和他者的形象演变。^③杰克逊认为文明本质主义对于国家中心的国际关系研究用处甚微。文明成员资格似乎并不是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最重要属性。如果认真分析文明本质主义的基本观点,国家中心主义本身在面对不可调和的文明差异时就会消失;而卡赞斯坦与亨廷顿的主张正好相反,他认为如果真的相信范围更广阔的文化共同体是世界政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么把研究重点继续放在国家行为体上就没有太大的意义。^④

伊曼纽尔·阿德勒、霍尔和杰克逊将文明视为社会建构的实体。^⑤一种新型的文明实践共同体及其内嵌的政体的出现,是文明史上的重大转折点。^⑥这一实践共同体的内容即安全共同体实践,也就是以自我约束为特征的新的文明化实践,它与现代的权力政治实践截然不同。作为“规范性力量”的欧洲,正在进行自我重塑,建构文明

① 参见 [美] 乔纳森·H·特纳著,邱泽奇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46~474页。

② Peter J. Katzenstein ed.,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ivilizational Processes Beyond East and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220.

③ [美] 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宋伟、刘铁娃译《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1页。

④ [美] 彼得·卡赞斯坦编,秦亚青、魏玲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223页。

⑤ Martin Hall and Patrick Thaddeus Jackson eds.,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Civil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England: Hampshire, 2007, pp. 33~51.

⑥ [美] 彼得·卡赞斯坦编,秦亚青、魏玲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74~75页。

的实践安全共同体,这一努力有可能改变国际政治的实践。^①建构主义者认为实践共同体是一个知识领域,拥有相似的思维模式,同时也是一个人类共同体,人类在其中共同创建了学习性的社会结构以及共有实践,而共有实践体现了共同生产、认可并维护的知识。一个文明具有动态的、不断更新的特征。^②

三、实证研究:美、欧的文明身份与中国的文明进程

在卡赞斯坦主编的文明政治三部曲中,《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发展了文明研究的理论框架,强调文明的多元多维并且将其应用于解释多个文明之中,而在后两本书中,建构主义学者详细探讨了中国化和美欧关系。显而易见,后两本作品的副标题(文明身份与文明进程)所传达的中心信息是文明研究需要超越东西方的明显界限。^③这两本论文集的发表无疑对于理解美国与欧洲之间的文明身份,以及中国崛起和中国的文明进程有着重要的价值。

1. 盎格鲁—美国与欧洲的文明身份

《盎格鲁—美国及其不满》特别关注自由主义与种族之间的问题,分析了盎格鲁美国文明身份的演变过程。以此书为例,尽管西方已经以多种传统的形式在美国、欧洲、美洲和南半球的几个地区出现,但是卡赞斯坦认为盎格鲁—美国仍可视为西方清晰可辨的独特部分,并且提出盎格鲁—美国与欧洲在文明身份上是不尽相同的观点。

从大英帝国开始到美国引领的二十世纪中期,盎格鲁—美国一直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此后发展到欧洲与美国的西部。卡赞斯坦认为盎格鲁—美国很独特,但并不是唯一。这些多元的西方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共存,只是涵盖多种现代性的全球文明的一部分。如同其他所有文明一样,盎格鲁—美国以多种传统和内部的多元化为标志,其核心是流动的而非固定的。^④美国精英视美国为多元文化社会的原因在于,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着大量的非洲裔、拉丁裔和亚裔族群。在美国与旧欧洲世界的关系中,美国化尽可能地不与它们正经历的、从相似的欧洲社会中自我分化的

① [美]彼得·卡赞斯坦编,秦亚青、魏玲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74页。

② 同上书,第75~76页。

③ See Peter J. Katzenstein ed.,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ivilizational Processes Beyond East and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reface.

④ Peter J. Katzenstein ed., *Anglo - America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al Identities beyond West and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1.

扩散过程相冲突。^①詹姆斯·库尔思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回顾美国文明身份的变化,可以发现美国已经脱离了欧洲文明意识,逐渐走向“全球新文明”。^②

与美国文明相比,欧洲的现代模式表现出两种属性。第一种根植于普世化实践,并以欧洲的进步观和理性观为基础;第二种根植于独特化实践,并以民族主义观念和基础。^③随着欧洲第一阶段文明的崩溃,美国承担起了西方领导者的角色,欧洲面临着新的抉择:衰落,抑或开始新一轮的创新实践,以期将欧洲重塑为具有吸引力的磁极。在失望和学习的渴望双重推动下,欧洲选择了自我重塑,希望藉此成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威望区域”和“吸引力网络”,再次吸引全世界。因此,以反思方式建构的实践活动,通过实践共同体的能动性力量与政治实体的合法性力量,通过向外扩散传播,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这才是文明在政治世界中的表现方式。^④

可以发现,建构主义学者在厘清美国与欧洲的文明身份时,是基于两种文明的不同发展进程为考量的。从文明身份上看,美国化和欧洲化的两种身份在不断变化。^⑤这对于理解国际政治中,美、欧采取不同的国际行为具有启示作用。与此同时,美国自我文化身份的变化也是影响美欧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近年来双方在伊拉克战争及反恐问题上时隐时现的分歧,让美国政府曾数次对“老欧洲”表达不满。可以判定,这种不满的根源是由双方文明进程的不同走向决定的。

2. 中国文明的进程及其国际政治影响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无疑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受瞩目的大国。《中国化及中国崛起:超越东西的文明进程》从宏大的比较视野,考察了中国在和平崛起中的文明进程。中华文明意识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其中间杂着许多不同的种族和社会群体,构成了东亚各国人民间彼此互动。无论是回顾东亚封贡体系下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还是当前的中国崛起问题,都不能忽视文明因素的作用。

以中国为核心的儒家华夷秩序在古代的东亚国际关系中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儒家思想是多样的变体,并非中华特性的本质要素,亦非根植于一个王朝、政体,或者现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ed, *Anglo - America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al Identities beyond West and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5.

② [美]彼得·卡赞斯坦编,秦亚青、魏玲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69页。

③ 同上书,第77~79页。

④ 同上书,第80~82页。

⑤ Peter J. Katzenstein ed, *Anglo - America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al Identities beyond West and Ea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 222 ~ 225.

代民族国家。同时,在中国内部,儒家思想传统也与道教、佛教、伊斯兰、基督教、民间宗教、无神论与世俗主义等传统相辅相成。中华文明的不同支流,既来自于中国对儒家思想的各种再次造,也来自于周边邻国在自身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嫁接儒家思想时所采用的不同方式。朝鲜、越南和日本,尽管保留了其本土的和佛教的传统,但是它们出于不同的原因并通过不同的方式,采用和模仿了中国人独特的国家实践。与美国的自由主义相同,中国的儒家思想也是可塑的,并且充满内部争议。^①因此,“中国化”是复杂的,是在持续的互动中产生了共同理解,并覆盖了马赛克式的当地多样性。在此背景下的“和谐”并不是指平淡的均匀性,而有趣的多样性(和而不同)。^②

中国作为文明国家与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在东亚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影响了周边的国际交往的形成和社会实践,并且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发展了一种明确的儒家秩序。这一秩序在形式上看似不平等,但是在实际上却是平等的,而且这些国家享有实质性的自主权。^③

针对亨廷顿提出的中美文明之间必然冲突的论断,卡赞斯坦认为文明不是行为体,它们也并不冲突。相反,多个文明为行为体之间提供了相互交流与介入的背景。他认为,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和美国文明之间的关系发展充分证实了中国化发展的和平性质,但是他又进一步指出这并不是否认冲突的可能性。时至今日,亨廷顿预测的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其理论是为那些希望冲突的始作俑者所利用的。^④

四、总结与评价

纵观这几本论文集,建构主义学者的核心论断可以概括为多种文明共存于现代的文明体系之中,文明具有内在的多维性,多元多维的文明构成的世界是一种弱制度化的社会秩序。他们通过借鉴西方社会学家柯林斯、艾森斯塔德和埃利亚斯的文明

① [美]彼得·卡赞斯坦“世界政治中的文明: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和中国化”,《观察与交流》2011年6月30日版,第10~11页。

② Peter J. Katzenstein ed,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ivilizational Processes Beyond East and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209.

③ [美]彼得·卡赞斯坦编,秦亚青、魏玲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年版,第102~103页。

④ Peter J. Katzenstein ed,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ivilizational Processes Beyond East and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236.

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界建构了新的文明研究的理论视角。^①他们认为文明是理念建构的而非是政治性的施动者,文明没有决策力或是对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能力。因此,将文明作为研究单位,需要对置于文明世界政治中的个人、团体、或是制度行为过程进行展示。在反对本质主义上,他们更加注重文明中不同社会安排的特殊行为的扩散过程。不难发现,这些论断与先前卡赞斯坦主编的《国家安全的文化》是相对应的。毫无疑问,这些论文集为国际关系中的文明研究描绘了别样的画卷,与亨廷顿十多年前提出的“文明性质单一”且“文明间冲突”的论点可谓大相径庭。

1. 建构主义文明研究的贡献

建构主义学者在文明研究上取得的成果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这些努力所取得成就主要体现在:

首先,在文明研究的重要性上,建构主义学者认为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主义、多样化、泛宗教主义以及一种对共同道德价值的总体认同。文明研究超越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文明既削弱了现实主义对军事实力的崇拜,也削弱了自由主义所持有的普世的、世俗的自由主义规范,具有超出其他规范的内在优越性。因此,文明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其次,卡赞斯坦、杰克逊等人的研究代表了世界政治文明研究的最前沿,它所搭建的分析框架更为宏大。他们对大历史周期的观察,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国际关系的演变,并准确把握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②这种跨学科研究不仅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而且在方法上也比亨廷顿的研究更为严谨,所提供的大的图景更为完整和真实。这一特点可以从其对美国与欧洲的文明身份的分析上找到答案,即美国和欧洲的分歧源于其文明身份的差异。

再次,卡赞斯坦等人的研究有效地揭示了亨廷顿理论背后的主导意识形态因素,撼动了亨廷顿在文明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本质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外交》和《国家利益》等政策类期刊,其意识形态色彩浓重。但一直以来,对亨廷顿文明理论的批判大部分是基于实证分析,而在学理上的批判不足。建构主义的研究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从学理和实证两个方面批判了亨廷顿的理论,其中在本体论上的区分使其观点更具说服力。

^① 此外,这些建构主义学者还重新发掘了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政治学家路易斯·哈慈(Louis Hartz)、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等人的文明研究,为其研究创作了宏大的跨学科背景。

^② 王存刚“文明史探讨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以陈乐民、亨廷顿为个案”,《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39页。

最后,建构主义的文明研究更加强调关系性与互构关系,呈现了更加开放性的研究路径。与现实主义相比,建构主义的文明研究路径在中国崛起问题上得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结论。例如他们认为,中国的文明进程是由多样的行为、话语以及在个人和集体层面运行的子进程所构成的,它正在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环境。这些子进程相互关联,不仅通过中国自身的文化辐射影响他人,而且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当中国与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时,外界也在帮助中国进行重塑。^① 这些子系统既向外辐射影响他国,也将中国暴露于与其他文明的更深入的关系之中,也帮助改造中国。^② 因此,“中国化”究其本质是建立一个中国所欢迎的国际环境的过程,而且这些进程是关系性的并且是开放的。

可以说,建构主义者持有一种比较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国际关系现实,从宏观历史的进程看待文明间的关系,更加关心在文明过程中对文明身份的塑造。由于文明间的互动是由文明实践所决定的,而非由特定文明间的冲突构成,因此建构主义者认为文明研究应该被充分重视。这不仅可以丰富国际关系研究的多元化,而且能更好理解国际关系的发展。

2. 一些存疑及不足之处

建构主义学者在“破”了亨廷顿理论之后,尚未“立”起一套完善的文明理论框架,特别是在将文明界定为分析单元而非行为体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模糊不清与分歧:

首先,文明间的关系退回到由“实践”决定的理论立场,致使其缺乏理解国际政治的有效性和指导性。这一路径也对文明成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单元产生负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明作为整体的研究价值。此外,卡赞斯坦认为单独使用过程本体和属性本体的文明研究,都可能出现一些偏颇。基于这一原因,他提出了弥补该缺陷的方法,即强调兼顾属性本体和过程本体的文明研究。这种调和使得建构主义文明研究内部出现了分歧和争议,尤其是关于文明作为行为体(施动者)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如卡赞斯坦认为文明是国家的行为背景,而非国际关系中的独立行为体,而杰克逊则认为从更广阔的层面上看,文明可以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行为体。如何弥合建构主义内部的争议是其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前提。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ed, *Sinic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 Civilizational Processes Beyond East and Wes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 235.

^② Ibid, p. 210.

其次,对文明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和文明内部的多维多元着墨较多,给人造成一种有意回避各文明互动中的冲突之感,进而使得建构主义在探讨国际安全问题时显得不够令人信服。正如卡赞斯坦所言,亨廷顿的研究多发表在政策研究期刊上,而他的研究属于学术建构,两者之间的鸿沟凸显。但值得注意的是,卡赞斯坦在强调文明的多元多维特征以及文明的概念是混合物的同时,并没能充分阐述文明能否作为一个独立分析的概念,特别是将其用于对国际冲突的解释之中。

最后,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比较起来,国际关系学界对文明的理论研究无疑仍显稚嫩。^①他们从社会学的现有理论中汲取营养的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了消化不良。这种严重倚重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整合,其理论远不如亨廷顿的文明理论简洁。借鉴与整合仍然是建构主义的文明研究中一个需要调和的难点。未来,学者在进行针对不同区域的文明分析时,还需将文明作为国际政治中一种分析性建构上努力,进一步推动理论与实证的同时发展。

总之,当国家把某一特定文明作为成长中的有机体来对待时,国内或国际上的政治怨恨便会产生。^②无疑,建构主义的研究有助于更为理性、客观地理解和建构国际关系现实。他们的文明研究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并在跨学科研究的推动下,有力地促进了近年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文明问题的反思性研究,并且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① 秦亚青“文化、文明与世界政治:不断深化的研究议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第15页。

② [美]查尔斯·A. 比尔德,玛丽·R. 比尔德著,许亚芬译《美国文明的兴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9页。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Abstract: Mainly from the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an international actor, being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violates international norms that they support and maintain,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rationalist and constructivist points of view on this issue. This paper takes the European Union's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ibya as a case to study, arguing that the actors who successfully violate existing norms are the ones who have found a better solution on their psychological "moral dilemma." The way of this solution mainly depends on the actors reframed and reinterpreted existing norms, as well as the strategy for stigmatizing targets.

Keywords: violation of norms, politica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actors, EU

About the Authors: He Gang is a doctoral student major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He Gang

125 After Huntington: Constructivist Research on Civilizational Politic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estern scholar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ve shown a strong interest in civilization research and it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with many related anthologies being published in succession in which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edited by Patrick Jackson and Martin Hall, as well as the trilogy of civilizational politics edited by Peter Katzenstein, have made a significant academic impact. By using civilizational research finding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for reference, these constructivist scholars have enriched the agenda of civilizational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ealed the ideological factors behind Huntington's theory effectively, and shaken the dominance of his civilizational studies. These stud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forging civiliz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direction of civilizational process while emphasize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civilization. These constructivist scholars also explore important areas such as the US-EU relations and the rise of China by empirical research. Their academic efforts not only promote the civilization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Keywords: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Huntington, constructivism

About the Authors: Dong Liang is a doctoral student major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Class 2012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Dong Liang

Summary of Meetings

141 A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Entitled "China's Diplomacy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Strategy and Prospects"

146 A Summary of the Symposium o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History"